

張其昀與我國文化教育（下）

● 宋晞（前國防研究院講座，中國文化大學教授兼文學院院長）（本文插圖刊第三頁）

主持發展各級教育

民國四十三年（一九五四）七月，張氏出任教育部長，對各級教育均甚重視。舉其要者，有國小教師的培養、新竹免試升學的舉辦、社會教育的重視與高等教育的發展等，茲分述之。

（一）國小教師的培養

為提高國民教育師資之水準，設置國民小學教師研習會於臺北縣板橋。民國四十四年春天，張氏約見新竹師範附屬小學校長高梓女士，談如何提高國校教師素質，希望她負責籌備一所國校教師的進修機構。高女士以在新竹師範附小七年多的耕耘播種，數度書面懇辭，均未獲准。但最後還是答應了。高女士回憶說：

回到學校，我數度書面懇辭，均未獲准，最後由於張部長的一句話：「辦好附小，僅能惠及千百個兒童，辦好一個教師進修機構，可以加惠全國數百萬個兒童。」終於使我舉手投降了。（註二一）

研習會的正式名稱是「臺灣省國民學校教師研習會」，於民國四十五年五月十日在板橋浮州

里正式成立。張氏於四十五年七月九日在該會講「新竹教育實驗的發軔」，開頭就說：「貴會主任高梓先生原係新竹師範附屬小學校長，她自國初年即獻身於教育事業，本人以其辦學卓著成績，故特延聘來此。今後國民教育的改進，新竹師範附小可算是一个起源地。」（註二二）末了他又說：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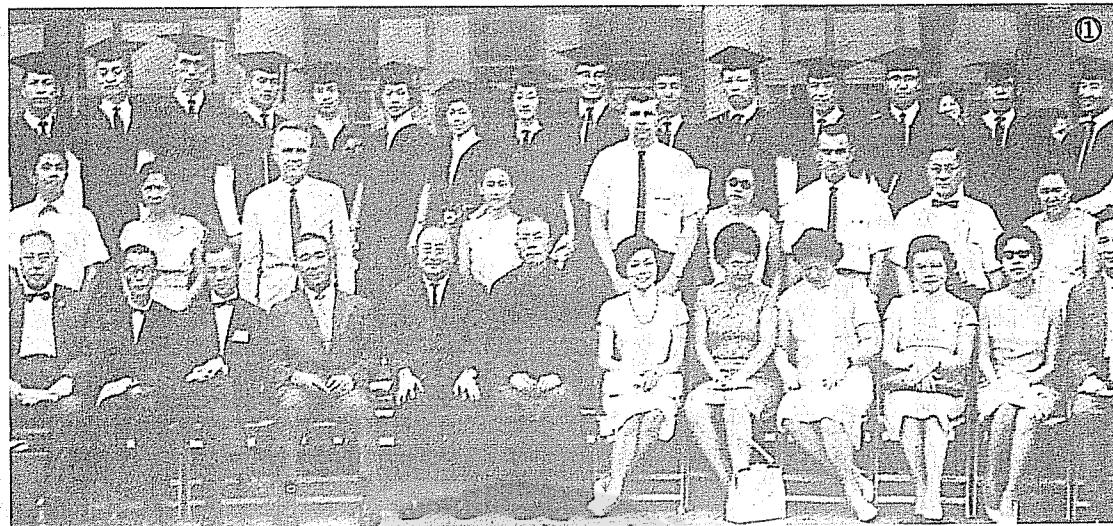
臺灣省國民教師研習會，其目的乃在供給教師以進修機會。中學階段自亦同感切要。教師節是中國歷史文化特有的紀念日。希望今年九月二十八日舉行教師節紀念儀式時，政府與學生家長合力共謀，予教師們以物質上、精神上種種鼓勵。目前新竹縣優秀小學教師入會研習，為期四周，以後輪流調訓，俾改進國民教育之各種設施，得在貴縣提早實踐。此一實驗工作即由高主任負責輔導。（註二四）

高女士自民國四十四年八月正式籌備開始，直到五十八年七月離職為止，足足十四個年頭，她說：「在我一生中，同一職務耗得最長的，就屬此時了。」此對國小教師的培養之貢獻是很大的，對張部長的一番苦心與卓見更可留於史冊。張氏曾回憶說：

本人在部四年，平日有一件最用心的事，那就是對於國民教育的重視。國民教育司是本人任內恢復的，聘請葉楚生女士為司長，意思是鼓勵優秀女青年多多擔任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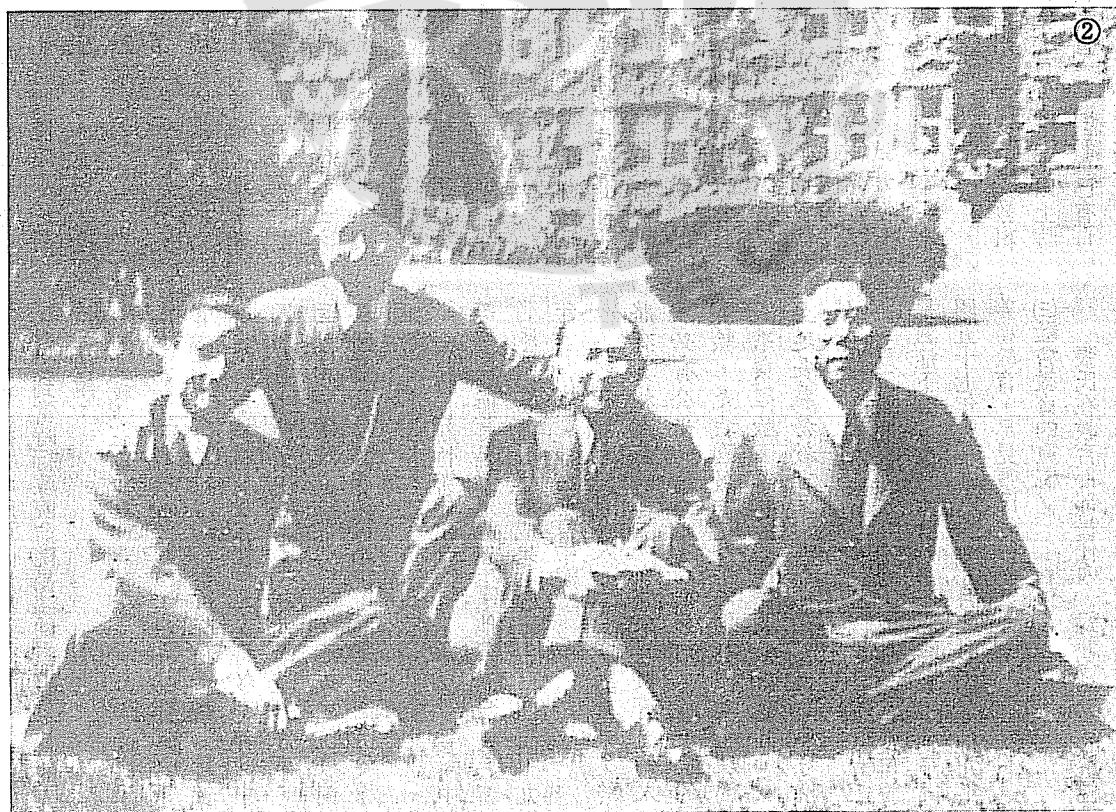
就是初中教師也要有研習的機會。同年七月二十日在新竹各界教育座談會上講「新竹教育園地的播種」，論國民教育，有云：

省立新竹師範附屬小學是全省最著名的個小學，該校校長高梓女士，現已升任為全省國民學校教師研習會的主任。該會業已正式開辦。自九月份起，將儘先選調



①民國五十三年張其昀博士（前排右七）與文化大學第一屆研究所畢業師生合影

②民國三十二年張其昀博士（右一）在哈佛大學校園內留影。



(下) 與我約期的文化教育

國校教師。教育部在臺北縣板橋公園設有臺灣省國民學校教師研習會，當創辦之初，本人向總統報告，總統說這是「根本之圖」。每一期研習會，本人都親自參加。並把總統訓詞告訴各位教師，就是我們教育宗旨，第一是注重體育，第二是注重音樂。我們要培育兒童堅強的體格，和優美的情感，必須有了健全的身體和健全的精神，打好一生事業的基礎，那麼從事學習，自然會事半功倍，勝任愉快。研習會的主持者是老教育家高梓女士，她付出了寶貴的心血。現在結業學員已達三千人，良師興國的精神，逐漸瀰漫於寶島。這種無形的精神成就，是無赫赫之功可言的。（註二五）

(二) 新竹免試升學的舉辦

免試升學方案是為籌備延長義務教育年限的準備工作。民國四十五年七月教育部在新竹縣開始試辦免試升學方案時，有其事實上的迫切要求，那就是大多數家長意見，以為讀書本是樂事，現在則變為苦事，不但兒童苦，父母亦苦。一到小學五、六年級，全家都緊張起來，惡性補習，深夜未休，影響睡眠，有害健康，且使全家寢食不安。張氏說：「當年新竹縣政府於四月間宣佈自秋季開始實行免試升學，惡性補習都立刻停止，真有立竿見影之效。」（註二六）免試升學實施以後，當時批評甚多，贊否不一。究竟如何？

要事實證明。張氏說：

本人離開教育部後，新竹實施免試升學

，還只行了兩年半，初中學生尚未畢業，教育實驗尚未期滿，便由行政院下令停辦。是年（四十八年）暑假，出人意料，臺

北市各公立中學聯考成績最優的一名，乃是一位外來的新竹縣立第二女子中學首屆

畢業生朱以錚女士。該校是所謂「免試初

中」，即因實行免試升學方案而新設立者

，校長為周秉維，雖諸事草創，而辦學認

真。但此一成果乃出於偶然，因朱女士之父為一工程師，適因調職而遷家臺北，於

是不能不在臺北考高中。如其父不調職，則無此比較機會。她在新竹考取高中，有誰注意？批評重量不重質的人，恐怕至今還嘵嘵不休呢？（註二七）

（當免試升學停辦時，新竹縣議會議長鄭玉田曾說：「我代表新竹四十三萬民眾，反對此種決定。」）（四十八年一月二十四日中華日報新竹訊）

（三）張氏亦云：

新竹人士說，試辦三年以來，新校舍陸續建成，設備正在分期充實，師資素質逐年提高，學生成績日有進步，惡性補習徹底消除，國民教育恢復正常，新教育的實驗，可謂已經接近成功之境。免試升學戛然中止，是一件令人惶惑的事。（註二八）

我相傳公道自在人心，不久的將來，終將有真相大白的一天，將來寫教育史的人，必有公平的論評。無論如何，這一次的實驗，是我國教育史上的創舉。其辦理的成果與經驗，對於今後發展初中教育，以至延長義務教育年限，都有重大的參考價值。

為了徹底根除惡性補習，免試升學方案可說是對症下藥，也是未雨綢繆，為國儲才。到了民國五十七年（一九六八）九月政府全面推行九年義務教育，足見張氏之目光遠大。

(三) 社會教育的重視

張氏在教育部部長任內，對社會教育的重視

，政府便應考慮延長義務教育。臺灣兒童已有百分之九十五入學，延長義務教育勢不容緩。」（

註二九）並勸我政府可向世界銀行請求貸款。張氏還說到當時行政院俞院長鴻鈞對他辦教育的支持，他說：

當我就任教育部長時，他只乾脆的說了

兩句話：「教育你去辦，我支持你。」事

實證明，每當行政院舉行院務會議，對教

育案有爭議時，主席都是支持教育部。中

國教育上能出現初中免試升學這一件事，固然由於總統的英明領導，亡友俞院長對

於閣員分層負責的授權，也是一個主要原

因。（註三〇）

當時在新竹辦免試升學時，新竹縣教育科中

等教育股股長是梁宗鋗先生，他曾寫過一本「新竹縣實驗免試升學的成果」的書，於民國四十九年三月出版，他在前言中說：

我相信公道自在人心，不久的將來，終

將有真相大白的一天，將來寫教育史的人

，必有公平的論評。無論如何，這一次的

實驗，是我國教育史上的創舉。其辦理的

成果與經驗，對於今後發展初中教育，以

至延長義務教育年限，都有重大的參考價

值。

為了徹底根除惡性補習，免試升學方案可說

是對症下藥，也是未雨綢繆，為國儲才。到了民

國五十七年（一九六八）九月政府全面推行九年

義務教育，足見張氏之目光遠大。



①張其昀博士（中）與蔣緯國（左）、陳立夫（右）合影。

②右起：作者宋晞教授、張其昀博士、台北市浙江大學校友會會長劉奎斗合影。



中。南海學園內有國立中央圖書館、國立歷史博物館、國立臺灣科學館、國立教育資料館、國立臺灣藝術館與獻堂館。

國立中央圖書館於民國四十三年八月正式恢復，由蔣復璁先生出任館長，該館除一般業務外，並為國家對外圖書交換之法定機構。館址係利用日據時代的神社，房屋不敷，又以新臺幣四萬元添築書庫一座。張氏云：「與該館有交換關係者，凡六十一國，圖書館及學術機構二六八處，各國大學漢學教授一十八人。閱覽人數本年（四十七）一月至五月平均每月二五、二四六人。」（註三一）

(下) 與其約文化教育我國

復，由蔣復璁先生出任館長，該館除一般業務外，並為國家對外圖書交換之法定機構。館址係利用日據時代的神社，房屋不敷，又以新臺幣四萬元添築書庫一座。張氏云：「與該館有交換關係者，凡六十一國，圖書館及學術機構二六八處，各國大學漢學教授一十八人。閱覽人數本年（四十七）一月至五月平均每月二五、二四六人。」（註三一）

國立歷史博物館於民國四十五年二月成立，當時國立故宮博物院及中央博物院在臺中霧峯，惟臺北市為中央政府所在地，中外觀瞻所繫，需要有一象徵中國文化之地址，教育部即以河南省立開封博物館及戰時日本在我國所掠劫而於戰後歸還我國之歷史文物，以及該部所保管之文物，入藏歷史博物館。該館館址係利用日據時代之商品陳列館，房屋亦感不敷，乃添築鋼筋水泥之陳列室一座，以供展覽珍貴古物之用。首任館長是包遵彭先生。四十七年一月至五月，參觀人數平均每月一七、四〇一人云。（註三二）

國立臺灣科學館與國立教育資料館互相配合，科學館為一至四層，教育資料館在科學館上層，即五與九層。科學館是有關科學教育之陳列與表現，除供一般學生及市民參觀外，並可藉電化而擴大其功效。該館之建築經費與設備費來源，張氏云：

建築費共新臺幣三百萬元，由陳濟棠先生遺囑捐助一百萬元，本部歷年積餘款項二百萬元。設備費一部份出於本部預算，並向美國購到全套中學科學教育適用之儀器，以供實驗；一部份由於捐助，如底層星象儀室，由國立清華大學基金利息捐助。開放以來，觀眾極感興趣。（註三三）

教育部鑒於中小學校程度不齊，設備未充，擬實施電化教育，利用教育廣播與教育電視，給標準化的教材，統一施教，以期提高水準，由國立教育資料館為教材研究之中心，其成果可直接播送各校教室，此為改進教學最新工具與捷徑。

建築設備費合計二百四十萬元，美援經費及教廳協款各佔半數。當時筆者任職於美國華府我駐美大使館文化參事處，四十七年四月奉部令調回

國內，出任教育資料館館長（原館長係由教育部社會教育司劉司長兼任），並囑於返國前，可參觀美國教育電視設施。我曾於是年六、七月間到巴爾幹鐵山參觀市教育局、州教育處及公共圖書館，紐約市參觀視聽教育局及教育廣播與教育電視等設備，哥倫比亞大學師範學院的電化教育設備，紐約州教育處、圖書館及華府附近Hagerstown教育局所屬教育電視系統，包括工程設備、教材與節目安排等。九月返國，教育部長已是梅月涵先生，他以該館經費不足，開展不易，不贊成我去接任，留在部裏協助他。後來，我把搜集到的相關資料送給該館參考。

國立臺灣藝術館為國立藝術學校之實習場所，兼為各種藝術如美術、音樂、戲劇、舞蹈、電影等之活動中心。於四十六年四月成立，建築經費新臺幣一百五十萬元，由教育部與省教育廳各負擔半數。該館劇場雖僅能容納七百餘人，但因梯形坐位，收音良好，為一適宜之實驗劇場。民國四十七年一月至五月參加該館各項藝術活動者，平均每月計達二八、二六〇人云。（註三四）

獻堂館為臺灣省督宿林獻堂先生逝世後，其友親屬為紀念林先生一生在經濟文化上之貢獻，爰集資新臺幣一百萬元捐助給教育部而建築，成為當時我國與國際文化合作之一中心，用意至善。該館於四十六年光復節落成，教育部所屬中國文化研究所即設在其內，國際學人來華考察及通訊詢問，由該所負責聯繫之責，並發行英文中國文化季刊，頗受國外漢學家之重視。筆者於四十七年九月返國，不久即接任該季刊之主編。

上述六館均有其特殊之意義與功用，對推進社會教育，影響所及，頗為深遠。當時費去有限的經費，所建各館均含有中國建築之風味，此當為「美矣美侖」印象所由來。張氏有云：

其實建築費用，由於設計者之用心反較一般建築為經濟，科學館即其證明。世界大都市，其公園往往與文化機構毗連，今臺北市植物園與南海學園互相配合，使一般學生與民衆，有左右逢源相得益彰之樂趣，此亦近年教育建設中比較令人滿意者。至其內容之美富與充實，當賴各館同人長時期不斷之努力，與社會上多方之協助，但政策責能力行，耕耘必有收穫，此則吾人所當深自策勉者也。（註三五）

時至今日，南海學園除中央圖書館另在中山南路建新館外，其餘各館確在充實內容，不斷努力中，庶不負張氏在當時排除萬難，重視社會教育的一番苦心。

(四)高等教育的發展

張氏接任教育部長，對高等教育之發展亦非常注意，如首先促成國立政治大學的復校，選擇木柵為校址，聘陳大齊先生為復校之首任校長。公立清華大學、交通大學、中央大學與私立東吳大學、輔仁大學相繼復校，及准私立東海大學之設立，請曾約農先生為首任校長。又改臺灣省立師範學院為師範大學，於是大學林立，人才輩出。又設立國立藝術專科學校，邀張隆延先生為首任校長，以培植音樂、美術、戲劇、舞蹈及電影、電視之人才。且於各大學廣設研究所，如清華大學是先設原子能研究所，中央大學是設地球物理研究所開始的。使大學部畢業生在國內有深造的機會，不必擠向國外，且於碩士班之上，建立博士班制度，首先設立博士班的是政治大學的政治研究所與省立師範大學的國文研究所，如周道濟與羅錦堂即為我國最早自己培植的法學博士與文學博士。同時，也舉辦公費留學考試，第一屆公費生以留美為主，計錄取十七名，如王德昭之與歷史，韓偉之與醫學等，彼等學成歸國，各展長才。

張氏於民國五十一年創辦中國文化研究所於陽明山華岡，下分十二學門，招收碩士班研究生，一律公費。次年大學部成立，十五個學系奉准招生，乃易名為中國文化學院。華岡原是橘子園

，並無地名，亦無建築，張氏取義於「美哉中華、鳳鳴高岡」之意。經他慘淡經營，傑閣重樓，高臺複道，聳然突起，蔚為奇觀。登臨其地，俯瞰平原，河海交流，後擁羣峯，有如畫屏，使人胸襟灑然，心曠神怡，有「振衣千仞岡，濯足萬里流」的氣概，為教學與研究的理想處所。民國六十九年（一九八〇），教育部以華岡興學，已屆滿十八年，而成效卓著，乃核准改為中國文化大學。他說：「華岡十八年來，從荒煙蔓草中，建立起大學城，沒有什麼秘訣，就是校歌所說：『必有真知，方能力行。』力行就是一個做字。」（註三六）現在在校生有一萬九千人，畢業生已達九七、八四四人，替國家培養人才，貢獻良多。夫以一赤手空拳之書生，闢草萊，除榛莽，歷經艱苦，不懈耕耘，卒以堅毅之精誠，成此宏偉之事業，誠非常人之所能為。

推動國際華學研究

華學亦即漢學，也是中國學。我國歷代學者研究儒家經典，漢代注重訓詁，宋代注重義理，因此有漢學、宋學之名。西方學者研究中國學問，有Sinology一字，中譯為漢學，易與上述漢學的含義混淆不清。尤自二次世界大戰以後，彼等研究風氣不以古代中國為限，且及近代與現代中國的各方面，乃有「中國研究」（Chinese Studies）名辭的出現，至此，Sinology譯為中國學或華學則較為合適。

張氏對華學研究的推動，早在來臺初期，如前述「學術季刊」與英文本中國文化季刊的創辦

，即為發表中外學者研究中華學術心得的園地。他擔任國防研究院主任期間，與中國文化研究所合作曾出版過「世界各國漢學研究論文集」兩輯，第一輯於民國五十一年九月出版，收論文十二篇，包括日本、韓國、越南、香港、印度、美國、法國、德國、義大利、瑞典和荷蘭等國。第二輯於五十六年一月出版。收論文十三篇，包括菲律賓、新加坡、馬來西亞、土耳其、澳洲、英國與烏拉圭等國。頗獲國內外學術界的重視。我於民國五十年所撰「美國的漢學研究」一文，收入該論文集第一輯，美國夏威夷大學東西文化中心為之譯成英文，列為該中心專刊之一。

民國五十五年（一九六六）國防研究院奉兼院長蔣公之命，組韓、日、美、加四國訪問團，張氏任團長，劉安祺副之，團員有徐培根等八人，筆者亦其中之一，於是年六月出發，八月返國，以考察國防教育為主，藉為改進該院教育之參考。以在美國停留時間最長。張氏於訪問華府期間，特別對美國國民研究院（National Research Council）的宗旨與組織感到興趣，返國後即著手籌設中華學術院，於同年十月底成立，下設二十個分科協會，旨在聯繫海內外學人，加強對華學的研究。與中國文化學院互相合作，為姊妹機構。五十七年（一九六八）八月，舉辦第一屆國際華學會議，以人文科學為範圍，主題是「宋元明時代（西元十至十七世紀）中外文化發展及其交流」，出席學者二百一十二人，來自亞歐、美、澳等四大洲，十九個國家，宣讀論文一七五篇，收穫豐碩。張氏在開幕與閉幕均致辭

， 在閉幕辭中談到中華學術院是一個民間組織，

首屆國際華學會議的舉行，並未請求朝野各方經費補助，而外國來的學者多於在本國的，他們各自籌旅費，熱心響應，成爲精神道義莫逆之交。

各篇論文都有創造性的貢獻，像這樣的高水準的力作，出自各國學者的手筆，愈使本次會議內容充實而有光輝。五十八年續辦此項會議，以社會科學爲範圍，會議前夕，因某種原因而臨時停止，已來華學者，改開座談會。殊不知此民間機構主辦大規模的國際學術會議，卻開風氣之先，亦見張氏之高瞻遠矚也。

中華學術院所屬二十個分科協會，經常集會，作學術討會，並出版研究彙刊，如「史學彙刊」、「地學彙刊」、「戰史彙刊」等。張氏以院長身份抽空參加。後來又附設若干不招收研究生的研究所，如宗教與道德研究所、天主教文化研究所、土地資源研究所及世界華學研究所等。下設華學文庫，創辦華學月刊、世界華學季刊。華學月刊內容主要爲本國學者研究著述之貢獻，世界華學季刊則純爲世界各國學者對華學研究重要著述之譯稿，與各國華學研究近況之概述。他在「世界華學季刊」「序一」中說：「本刊宗旨，係欲對國際學人有關中華民族之學術研究之成果與業績，加以引述、摘述、譯述或評論，集爲論叢，而定名爲世界華學季刊。」在該刊「序二」又說：「華學者中華學術之簡稱，其研究之對象，乃中華有史以來思想、學術、文化、文物所形成偉大之學統，或曰中華之道統。」對華學及其研究有更明白的說明。

鼓勵台灣地方志之纂修

具有知行合一的決心與勇氣。

隨後他又說：

張氏來臺以後，以學者從政，自奉甚儉，力竭從公。然對政策的研擬多具前瞻性，既經決定以後，就切實執行，以底於成。如遇到經費上的困難，每能獲朝野人士的支持，其舉辦社會教育事業，就是一例。其對臺灣文化與教育上的貢獻，除前述瑩華大者四項外，尚可補述者有下列二事：一是重視臺灣鄉村教育；二是以現代科學方法纂修臺灣地方志。

他在民國四十六年春天，到臺中參加故宮博物院陳列室開幕典禮之後，以三天時間，到雲林、嘉義、臺南三縣考察鄉村教育。他說：「就中比較有成績的，爲臺南縣的善化小學、白河小學，雲林縣的虎尾女中，嘉義縣的南光中學、東石中學等，都有新的精神和進步。」（註三七）那次同行人士中有一位是美國卡薇麗（Dr. Verna Carley）女士，是美國哥倫比亞大學師範學院教育學博士、史丹福大學教授。她對中國、日本、印度三國的鄉村教育均有長久的服務經驗，本於實地觀察所得，而作一扼要的評論。卡薇麗博士說：「印度人的習性是等待、等待、等待。日本人的習性是模仿、模仿、模仿。而中國的農民卻說：沒有問題、沒有問題、沒有問題。」並經詢問張氏的意見。張氏答道：

中、日、印三國國民性的比較果如女士說的，這恐怕與文化背景有關。「等待」的人是重知輕行，「模仿」的人是重行輕知。自認爲「沒有問題」的人們，那就是

我們當前復國建國的任務，雖然困難重重，只要大家能夠即知即行，以樂觀積極的心情來解決各項實際問題，當然一切都可以迎刃而解了。臺灣鄉村教育果然是饒有生氣的話，其真正原因當在於此。（註三八）他看到幾所優良學校，已經實行分科教室制，各科教室都陳列有關的教學用具及自製教具，課桌排列亦採不同方式，以便於研習討論云。他認爲由於科技深入農村，衛生環境改善，農村副業改進，生活水準隨而提高，民衆對教育因而發生更大的信心。心理建設與社會改造，確在文明進步之源泉。這是鄉村教育最高的目標。足見他對臺灣鄉村教育的重視。

張氏在抗戰期間，當浙江大學遷至貴州遵義時，曾約請系、所教授纂修「遵義新志」，有此經驗，所以在民國四十三年由中華文化出版事業委員會出版「臺灣新志」，撰者有楊錫福地理篇，林朝榮地質篇與礦產篇，阮維周地形篇，陳正祥氣候篇，章光彩水文篇，席連之土壤篇與子景讓植物篇等，附有地圖與圖表。接著撰修「新竹新志」，於四十七年由教育部中華叢書委員會予以出版，撰稿者有畢慶昌等的地質，鄒豹君的地形，薛繼壠等的氣候，章光彩的水文，梁鉅榮的土壤，康瀚的森林，張憲秋等的土地利用及農業區域，林朝榮的礦產，稽昌先的人口，唐美君的土著民族，郭輝的歷史地理與黃旺成的文獻等，



民國二十四年張其昀博士任教中央大學時考察西北在敦煌莫高窟留影。

中外雜誌

凡二十五萬言。民國六十一年二月由中華學術院出版『陽明山新方志』，內容包括沿革、行政區域、地質、地形、氣候、水文、天然資源、人口、聚落分佈、交通、工業、農業、漁業、林業及畜牧與地名等，由蔣君章、鄭資約、楊錫福、姚國水、闢家冀、徐聖謨、任德庚、梁繼文、劉鴻喜、賀忠儒、石再添、王洪文、王秋原和陳國章等執筆。

他在序言中有云：「陽明山新方志之完成，僅為一出發點。其他各縣市新方志，尚待一一編纂成功，而對於理想中小區域之研究，尚須繼續作更大之努力。」中華學術院所屬臺灣研究所與地方自治研究所於民國五十七年十月起與國防研究院合作編印「臺灣方志彙編」，稱為臺灣叢書

，主編者是方豪教授，收有臺灣方志二十六種，包括通志、府志、廳志、縣志及採訪冊，且以清代為限。讀者便焉。

總之，張氏自民國三十八年夏渡海來臺，迄至七十四年八月二十六日病逝為止，在長達三十年間，以在教育崗位上時間最長，然後文化出版事業始終關切。其對臺灣文化與教育上的貢獻

，本文所述，不過是舉舉大者而已。

註釋

註二一：高梓，「我的十四年長跑——從簡陋中成長的國教研習會」，民國八十年六月十二日中央日報副刊。

註二二：張其昀，「新竹教育實驗的發軔」

，張其昀先生文集，第十七冊，頁

註二三：同前，頁八六〇四。

註二四：同前，頁八六〇五。

註二五：同前，頁八六〇六。

註二六：同前，頁八六〇七。

註二七：同前，頁八六〇八。

註二八：同前，頁八六〇九。

註二九：同前，頁八六〇一。

註三〇：同前，頁八六〇二。

註三一：張其昀，「南海學園之興建」，前引書，第十八冊，頁九五六三。

註三二：同前，頁九五六三。

註三三：同前，頁九五六四。

註三四：同前註。

註三五：同前，頁九五六五。

註三六：張其昀，「創業辦事經驗談」，民國六十九年四月十二日中央日報副刊。

註三七：張其昀，「臺灣鄉村教育的觀感」，前引書，第十六冊，頁八四四九

九一五八。

註三八：同前，頁八四五〇。

註三九：同前，頁九一六三。

註四〇：張其昀，「新竹教育園地的播種」，前引書，第十七冊，頁九一六七。

註四一：同前，頁九一六七。

※本文曾在民國八十年八月中旬舉行的「中華民國建國八十年學術討論會」上宣讀過。八十二年八月訂正。